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

项久雨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指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本身。价值理性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以人的主体性为中心，同时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完成对客体精神质量的批判和建构，从而真正体现人的本质。它的内在规定性由四个方面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一种目的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是一种批判理性；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是一种建构理性。这种内在规定性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这是因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个人或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存在着差异、矛盾和对立，导致了价值目标的差异。这种针对价值目标差异而产生的冲突就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的发展。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目的理性；主体理性；批判理性；建构理性

价值理性一词最早出现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在韦伯看来，价值理性是指“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韦伯，1997：56）。虽然韦伯天才地提出了价值理性这一重要概念，但其推崇的却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体现了主体对思维客体规律性的认知和驾驭，它主“真”，导向真理和认知，用来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回答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如何”的。价值理性体现一个人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它主“善”，导向决断和行动，用来对人类自身与世界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是”进行判断。价值理性关怀人性世界，源于人类的终极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纷争是一个长期讨论的学术问题。工具理性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为了满足阶级统治的需要而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其指向是阶级、国家和社会，其价值表现在为阶级、国家和社会培养符合要求的公民。与之不同的是，价值理性则指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本身，价值理性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以人的主体性为中心，同时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完成客体精神质量的批判和建构，从而真正体现人的本质。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一种目的理性

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在从事某一项活动时有着明确目的性。马克思曾经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马克思，2004：208）。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的一项实践活动，其价值理性首先体现为目的理性。这种目的理性追求自身行为的合目的性，追求结果的合目的性，并且在追求合目的性的同时坚持目的性与工具

性的一致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追求自身行为的合目的性。任何社会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教育活动尤为明显。价值理性本质上属于一种价值理想和价值目标。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是以价值和目标为依据,并且在这种价值、理念、目标和理想的引导下完成的,实际上就是对价值理性和价值目标的追求。从这个角度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追求自身行为的合目的性首先表现为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和规律,作为一项价值实践活动,在追求自身行为的合目的性的过程中体现其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的社会活动,永远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它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将社会指向作为判断自身行为合目的性的一项重要标准。除此以外,人的需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的来源,人的行为是由思想支配的,人的思想又是由价值引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价值反映为人对物的需求程度以及物对人的满足程度。思想政治教育以人的需求为目的,但它并不囿于个体需要,而是谋求个体与整体的和谐共生。它并不否定人作为手段的意义,但它强调,“人本质上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作为手段,只有在以人为目的、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前提下才是合理的。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所诉求的合目的性,既是指合乎人的目的,更是指合乎其自身的目的。马克思把人的发展分为三种层次,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2009A:52)。马克思所预设的人的发展层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摆脱对物的依赖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自己独特的个性品质中实现自身的目的性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追求教育结果的合目的性。一般来说,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有两个层面的目的,指向社会的目的和指向个人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目的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等方面体现出来的价值,这种价值以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最终指向。但是过分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目的指向,无疑会让思想政治教育陷入工具理性的漩涡。“在当今这个只追求器物的时代,我们决不能忽略了思想的价值。在给年轻一代传授技术信息的同时,绝不应该忘记:还应当教育他们成为有高贵思想的、诚实而敢说真话的男女;在培养他们的能力的同时,绝不应该忘记:还应该培养他们高贵的人格品性”(斯迈尔斯,1999:封面)。思想政治教育固然有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责任和使命,但对人的发展与完善才是其真正的目的所在。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已经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其目标指向和价值追求开始由社会取向逐渐向人本取向过渡。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视野中,人才是终极目的,人是各种努力的终极关怀。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社会目的,都是要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的,而社会发展进步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个人的发展和生活的幸福。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满足人的合理性需要,都是为了维护、发展、实现人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都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提升人的价值、凸显人存在的意义,促进人更好地生存、发展和完善,趋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不同,它是以主体——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客体为中心的理性。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以人为本就是“把人作为主体和目的,而不仅仅是教育的客体和被改造的对象,把人作为教育的本质而不是单纯的教育结果”(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2006:287)。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以主体的需要为出发点、以主体的利益为发展动因、以主体的发展为终极追求,在其过程中,主体将自身作为检验思想政治教育成效性的重要尺度。

主体的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生成的前提。人的需要是人相异于动物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

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2012A:158)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指明了人类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和基本立足点就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人并不是为了需要来到人世,但是一旦为人就会带有各种需要。人类不断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首先就是满足了人的生存需要,其次就是实现人的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教育实践活动,应该“把人作为一种可以教育并需要教育的生物”(博尔诺夫,1999:35)作为探讨前提。人的教育需要是比物质需要更进一步的需要,其中包含了智力发展需要、道德发展需要、理想信念需要等精神层面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以解决人的道德需要、信仰需要等精神需要为出发点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价值理性的生成以人的需要为基本前提。

主体的利益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发展的动因。当代社会,利益冲突不仅仅表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更是已经深入到人的精神领域。人不仅要求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同时要求满足人的精神发展的需要。人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对象物相结合的时候就表现为人的利益,这种关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利益构成激励的基础和出发点,而利益的差异性导致的矛盾冲突则成为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因。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1995A:187)。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这是因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个人或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存在着差异、矛盾和对立,导致了价值目标的差异,这种针对价值目标差异而产生的冲突就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的发展。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主体的利益差异把思想政治教育对价值目标的追求建立在对自身提出的利益要求合理性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价值主体的利益差异又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和完善的动力,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是不断调节不同利益群体或个人,最终实现平等的过程,其中不仅仅是指物质利益,而是更多地指向精神利益、道德利益以及人的权利义务平等等方面。尽管如此,物质利益原则依然是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关系的反映,人们的思想问题大多是物质利益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映,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要关注的问题也不能完全集中在精神利益的冲突上,对物质利益的关注也是不容忽视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应该在人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之间做出平衡的分析和选择,引导人们追求自己的合理利益。

主体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的终极追求。价值理性是人们对历史和现实反思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价值智慧、价值良知、价值意识,这种智慧、良知、意识所诉求的是人自身及其所依附的生存载体的存在意义,亦即对人自身以及社会的可持续的全面发展的追求。人的发展需要思想的教育,保障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平等发展等,都需要以思想的真理来对人进行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对人的发展的关注位于核心地位,是各种价值追求的最终归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其中也包括思维的能力”;“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马克思、恩格斯,1987:320)后来,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2012B:53)全面发展理论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出发点,也是其价值理性的终极追求,它时刻昭示着思想政治教育要为此服务: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三、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是一种批判理性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社会的发展也是同理。处于任何发展阶段的社会都不可能是按照人的愿景自然生成的,而人又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因此,在任何特定的时空中,人总是有缺憾的,换言之,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都是不圆满的,它总是要给人们灌输这样的思想:生活在其中的现存世界是不完善的,是需要人自身去改变的。面对现存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所扮演的不是辩护者和守护神的角色,而是批判者、超越者的角色。

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以其深刻理论和现实性影响着整个世界的格局,并赢得“千年马克思”的称号。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扎根于实践的,它是随着科学发展、社会变革、人类进步的方向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一成不变、墨守成规,提倡在新事物、新思潮的碰撞中不断地发展自身。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一种科学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从旧哲学中解放出来,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武器。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就是挑战和批判原有理论的过程,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对以往以及同时代自然科学成果和社会科学成果扬弃的结果;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调就是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批判,这可以从马克思的许多著作的标题中看出,例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其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向就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不合理性的批判之上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马克思、恩格斯,2002:202)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诞生也是在与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无论是作为哲学理论还是实践指导思想,并没有获得全人类的认同,而是不断受到各种理论和思潮的冲击、质疑与挑战,甚至是攻击和谩骂。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在形形色色的反对声中成长和壮大,它依据唯物辩证法,对一切不合理的言论、行动和政策、措施等都能够进行理性否定并寻求完善,这种批判精神不仅让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者们感到恐惧,同时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并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通过批判推动社会的螺旋上升,它包含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三阶段的统一,通过这三个阶段,把对一种理论的认识转变为对其分析的过程,把思辨的方法转化为实证的方法,在肯定中批驳,在批驳中确立自己的观点。而马克思的批判与黑格尔批判理论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是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统一,正如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1995B:61)理论批判的最终目的是要为实践批判服务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就是要坚持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统一,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思潮,既要吸收合理因素,又要善于驳斥和扬弃,创造出超越性的理论,并且用这种批判性的理论去指导社会实践活动,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批判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的应有之义。科学的批判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思潮的引领有着深度的理论契合。马克思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社会思潮的过程,既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对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进行分析和判断、整理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从微观层面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就是通过各种方式,促进人的政治社会化和思想道德素质的全面发展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灌输、说理等方法将一定的思想观点方法传授给受教育者之后,通过受教育者的批判和反思,被受教育者认同和接受之后,内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自觉意识,最终外化为受教育者的行为。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就是帮助和促进教育对象不断完善和超越自我的过程,而实现这一超越的重要途径就是批判和反思。因此,批判和反思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求。从宏观层面来看,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社会落后现象、人类落后思想的反思、批判和总结,形成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正确的指导思想,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利用这种批判性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精神、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改革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科学发展的反思精神,无不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发展前景的理论反思和实践批判。所以,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还是其社会价值,都是批判的产物,但这种批判绝对不是盲目的、无意识的批判,而是一种理性批判。这种理性批判的核心是用积极的思想对抗消极的思想,具体来说,就是要实现思想的转化和转变,使落后思想转化为先进的,使错误思想转化为正确的;其主要内容是坚持主流意识形态,批判腐朽落后的思想意识,即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彻于政治、经济、法律、思想、道德、艺术、

宗教、哲学、历史等各领域研究,既要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腐朽落后思想作斗争,又要创造和发展先进的社会意识;其主要途径是以先进思想为引导,同时兼顾层次性和广泛性,即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同时广泛吸收传统思想和异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四、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是一种建构理性

建构理性源远流长,按哈耶克的考证,应该起源于笛卡尔的唯理主义,此后,以百科全书派的学者和霍布斯、卢梭、重农学派和孔多塞等人为著名代表(哈耶克,1997:63)。建构理性认为人类理性能力具有至上性,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在于人的理性能力,人类利用自己的理性可以洞察并掌握规律,进而运用规律,人类的一切制度与文明都是利用理性建构的产物。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实践活动,其实施过程也是建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人类在反思过去和现实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状态做出的理性建构。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对现存世界的反思、批判,蕴涵着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价值理性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精神力量,是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对人自身的生活意义和目的的认识、追求和践行,以及对人类生活的世界的实然和应然的反思与建构。“价值理性作为人类理性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在主体和客体的张力关系中,寻求主体方面的理解,在事实与价值的相对统一关系中,寻找价值的正当性理解,在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张力关系中,探寻超越性的内在品质,在手段与目的的相对统一关系中,寻觅目的的人性关怀。”(王岩、邓伯军,2009:120)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试图通过反思、批判、变革,从而实现超越,建构一个理想的、应然的、合乎人的本性和目的的美好世界。马克思曾经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2009B:527)在马克思看来,价值理性是人在实践活动中的自我认知、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创造的价值精神,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人的不断创造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就是以此为依据,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通过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交流,实现主客体的自我认知、自我超越,从而建构更高层次的目标,它总是要为人类设置实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是如此与应如此、是其所是与是其当是的矛盾,即在观念上建构一个理想的世界作为人类前行、趋赴的目标,给人以鼓舞、引领。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关注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是建构在人的生命基础之上的社会实践活动,它肩负着呵护人的生命存在、彰显人的生命价值、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建构人的精神家园的光荣使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以人的精神世界为基础,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通过解决人的思想问题、道德问题以及信仰问题,实现培养人、塑造人、发展人,最终完善人的价值追求。在这一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以人的实际状况为出发点,借助各种外力以及其本身对价值理性的坚持,建构出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理想人格模式,最终指向帮助人们认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在追求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过程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现代人生命物性化的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尊重人的物质利益需要,更重要的是强调人的精神需求对人生命的重要意义。帮助人们确立理想信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和永恒主题。

价值理性不只是观念地建构超越于现存世界的理想世界,而且支撑、鼓舞、引领人们通过实践去变革现存世界,建构应然的理想的世界,致力于使理想世界转变为现实世界。认识世界并不是目的,建构世界也并不是归宿,其最终指向是要实现人类社会从实然向应然的转变,将建构的世界通过人类的努力和实践活动转变为现实。从个人发展来看,人总是要突破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先是在观念上建构理想世界的模型,以其作为引领,之后通过实践活动使理想转变为现实。人正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构建的理想的支持、鼓舞、引领下不断地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改变和超越的。价值理性不仅是一种观念建构过程,而且也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发挥和应用过程,它充分体现了价值理性主体自由自觉的创造品格。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的发展不断向人类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就为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目标指向和更加深入的价值意蕴。人类总是处在不断实现现有价值并且不断追求

更高价值的过程中,正是因为人类对价值理性的不断建构,并且将其转变为现实,现实世界也由此而变得越来越美好,反过来又越来越使人得到永续的精神境界的提升。

参考文献:

- [1] [德]O·F·博尔诺夫(1999).教育人类学.李其龙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 [英]弗里德利希·哈耶克(1997).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
- [3] 马克思、恩格斯(1987).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
- [4] 马克思、恩格斯(1995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5] 马克思、恩格斯(1995B).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6] 马克思、恩格斯(200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7] 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8] 马克思、恩格斯(2009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9] 马克思、恩格斯(2009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0] 马克思、恩格斯(2012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1] 马克思、恩格斯(2012B).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12] [英]塞缪尔·斯迈尔斯(1999).品格的力量.刘曙光等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13] 王 岩、邓伯军(2009).试论政治哲学视域中的价值理性.哲学研究,6.
- [14] 马克思·韦伯(1997).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远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15] 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2006).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

On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Xiang Jiuyu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rec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its activities and its subject itself. The value rationality takes human development as the goal, regarding human subjectivity as the center, and in the meantime, completing the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objects' spiritual quality in th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o as to truly embody human nature. Its inherent regularity consist of four aspects: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kind of aim rationality;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kind of subject-centered rationality;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kind of critical rationality;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kind of rational construction. This internal requirement indicates that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constantly changing, for there exist the difference,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 in their interests between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social group as the subjec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ventually resulting in the difference in value goals. Thus this kind of conflict in value objective difference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im rationality; subject-centered rationality; critical rationality; constructive rationality

■作者简介:项久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Email:1464222369@qq.com。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KS011);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重大委托项目(14WHA0828)

■责任编辑:叶娟丽

